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
作风建设要防止

□ 孙照红

2022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一个人蜕化变质往往是从吃喝玩乐起步的。为什么党中央要从八项规定入手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因为‘四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是腐败滋长的温床。”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表面意思是指牙齿、衣服、器物等上面的小洞如果不能及时修补，等它破成大洞就难以修复了。这句话之所以被广泛使用，就在于它用质朴的语言揭示了事物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以及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哲理。日常生活如此，党的作风建设亦如此。习近平总书记用“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来比喻作风建设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强调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风腐同查同治，体现的是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深刻洞察。

小事小节反映品德、反映作风。党员干部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比如衣食住行的标准、待人接物的态度、会议发言的风格等，看似小事小节，但能够反映出其生活

作风和工作作风，折射出其思想觉悟和价值取向。在生活中铺张浪费、奢侈消费的党员，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一个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的党员；对群众来访不耐烦、敷衍塞责的领导，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一个坚守党的宗旨、为民服务的领导；在工作中“会议多、落实少”的干部，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一个工作务实、肯干敢干的干部。因此，小事小节绝非小事，它如同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干部的品德、作风；它如同一块试金石，检验出党员的党性。同样，小事小节也蕴含着对党员干部品德、作风和党性的考验。党员干部能否经受住这些考验，往往就体现在这些小事小节之中。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溃蚁孔，气泄针芒”“小孔不补，大孔叫冤苦”等古代经典和俗语，都是在提醒人们：小问题、小错误若得不到及时处理，任其发展下去，终将引发难以弥补的严重后果。无数案例表明，落马官员起初多是从接受一顿宴请、收受一份礼品开始的。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恩小惠、人情往来，若不及时纠治，就可能演变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大问题。同样，工作拖延、迟到早退等小毛病，若不能及时改正，可能演变成慵懒怠惰、责任意识缺失等问题，进一步则可能发展为违反工作纪律、滥用职权、决策失误。小节不慎，大节难保。唯有小过即问、小错即纠，才能防止积小错成大错、小问题发展成大祸害。因此，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警惕，从不迟到早退、不接受一次吃请等小事做起，培养良好的作风。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有着相同的根源和本质。在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践行“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核心在于强化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意识，即从纠正看似微小的作风问题入手，防止不良风气滋生蔓延，避免由“风”及“腐”。只有以“小洞”不可轻视、不可小觑的清醒认识和高度警觉，以“早察”“早补”“快补”的坚决行动抓作风建设，才能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中央八项规定作为改进作风的第一步，就是以“小切口”撬动“大变革”；从紧盯“一餐饭”“一杯酒”“一辆公车”“一场会议”等到严查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再到系统推进涵盖党风政风民风民风等在内的廉洁文化建设，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正是对“风腐一体”“风腐交织”特点以及从量变到质变、由“风”及“腐”规律的准确把握。当下，党风政风都有明显改善，但是，应清醒地认识到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反复性，认识到抓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坚持从细微处着眼、从点滴处入手，持续擦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作风建设的“金色名片”。

掌握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重温陈云《怎样才能少犯错误》

□ 唐国军

重读经典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帮助下，陈云深入探究“怎样才能少犯错误”问题，通过深度学习毛泽东著作特别是贯穿其中的实事求是思想方法，概括和阐释了“交换、比较、反复”的避免少犯错误的方法。陈云的这一思想成长历程，体现在《陈云文选》第一卷收录的《怎样才能少犯错误》中，这篇文献是1947年2月7日陈云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重温这篇经典文献，对于深入了解我们党重视掌握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陈云以“我们可不可以少犯错误？”这个具有普遍哲学意义的问题开篇，发人深省。他回顾了延安时期，就犯错误的根源问题向毛泽东求教的故事。陈云提到，“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由此，陈云将对犯错误根源问题的认识，从之前局限于“经验多少”校正到“思想方法问题”的正确方向上。在进一步思索过程中，陈云采用最直接的途径，“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希望由此探寻出科学思想方法到底是怎样的。

陈云从哲学上、思想方法上认识到错误的本质和根源。他写道，“错误到底是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这个认识正是唯物辩证法对错误的科学认识。陈云说：“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

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明确了错误的本质和根源，也就找到了回答“怎样才能少犯错误”问题的钥匙，就是要在决策和行动前努力做到主观对客观全面的、正确的认识，这就要求我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解和掌握客观情况上。为此，他指出：“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

循着全面“了解情况”以实现主客观相统一的思路，陈云进一步将人犯错误的原因聚焦到认识的“片面性”上。他指出：“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陈云结合自己的经历认为，认识的难点就在此处。他指出：“实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难以做到。”他说的“容易”，是说“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这看似是简单易行的；他说的“难”，是说我们常常容易“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要避免这个认识的片面性又是很难的。

“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

明确了“认识上存在片面性”这个犯错误的病灶之后，陈云给出了他对“怎样才能少犯错误”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

关于“交换”。“所谓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交换的目的在于能使自己对事物认识得更加完整”。陈云指出，交换的重点难点在“相反的意见”，“交换时要特别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要做到交换，特别是要做到同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同其他阶级的代表交换意见”。文中，陈云详细阐述了为什么以及怎样与“相反的意见”进行交换。他提出：“我们应该收集反对意见”，“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

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它驳得彻底。既然要批驳，就得找论据，这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他还以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方法为例，指出“各种资产阶级的、假马列主义的错误思想，为毛主席的真马列主义的正确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毛主席的著作都是采取这个办法写的”。可以说，强调与相反的意见进行交换，充分发挥相反的意见的认识论作用，是陈云思想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关于“比较”。比较的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性质、本质和发展阶段，“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陈云指出，“比较”有如检验黄金纯度的“试金石”、验血用的“参照的标准”，“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陈云还强调比较是作决策的重要方法，他以坚持在南满斗争的决策为例，“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了”。

关于“反复”。反复与交换、比较不同，具有认识和实践的双重属性。作为认识的过程，“反复，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作为实践与认识相统一的过程，“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陈云强调这是“最要紧的”。

在详述了“交换、比较、反复”的具体内涵之后，陈云总结道：“从我的经验看，如果上面说的三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历史和实践证明，陈云提炼总结的这三条思想方法结晶，指出了一条怎样做到实

事求是的正确途径。

“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

在深刻分析和回答了人“为什么会犯错误”“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问题后，陈云又专门论述了“怎样对待错误”的问题。他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是不充好汉，不爱面子”，要“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这也就是他一贯强调的“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认为“党内只应当有这种态度，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对于自己的错误，陈云认为不能文过饰非，要丢掉面子、正视错误，将错误视为成长进步的契机，否则将适得其反。他告诫说：“如果不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装洋蒜，一定要跌筋斗。愈怕丢脸，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对待别人的错误，陈云认为党内同志都要立足“客观事实”来认识，这样才能达成共识、减少扯皮，把事情办好。他指出，对犯错误的人“要把客观事实拿给他看”，“大家都根据客观事实想问题，定政策，自然可以求得党内一致”。

陈云进一步指出，一个人要做到正确对待错误和掌握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前提是要把立场摆正，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而不是为个人打算的个人主义立场。他指出：“论事不论脸，这里有个立场摆正。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真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反之，“如果尽是为个人打算，一辈子也掌握不了这个方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当前，我国发展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新形势新任务更加迫切地要求我们坚持和运用好实事求是这个制胜法宝，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

中国史研究应以中国为中心

——读〔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 沈桂龙

柯文是美国知名汉学家，他专注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撰写了多部著作，如《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十九世纪中国之改革》《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等。他批判性地对中国的中国历史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在西方世界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上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突出强调了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彼此理解和尊重。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首版于1984年，该书对二战之后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文獻进行了梳理，分析了许多代表性学者及其作品的主要观点。在书中，柯文主张在中国历史时更应从中国内部视角出发，而不是完全站在西方立场，并提出中国中心观的新研究思路 and 范式。

“冲击—回应”模式严重夸大西方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一些学者为代表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主导了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该模式将西方冲击视为中国历史发展或变革的主导性因素，其进程体现为“西方冲击”与“中国被动反应”的互动，强调是西方列强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冲击驱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中国对此的反应则是从“落后”到“进步”的被动适应过程。正如柯文在书

中提到的，“这一理论框架所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就19世纪的大部分情况而言，左右中国历史的最重要影响是与西方的对抗。这种提法又意味着另一假设，即在这段中国历史中，西方扮演着主动的角色，中国则扮演着远为消极的或者说回应的角色”。柯文认为，“19世纪中国历史可看成由若干不同层带组成”，有“最外层带”“中间层带”和“最内层带”，不同层带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并不一样，“最内层带”较少受到西方入侵影响，包含了“中国社会与文化长期变化的模式”，“很可能正是这种模式对晚清历史产生决定性作用”，而这并不能由“冲击—回应”模式所解释。

柯文指出，中国在19世纪对西方回应的这段历史，“必然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尽管具有历史的重要性，但与西方冲击并无关联，或者关联甚少。另外一些事情则虽然直接或者间接接受西方冲击的影响，但绝不能把它们看成仅仅是（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主要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因此，他也就否定了“冲击—回应”模式将西方的冲

击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导因素的合理性。事实上，“冲击—回应”模式严重夸大了西方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忽略了中国内部自主性的实际情况，难以对中国近代历史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不是只有西方的近代化才是唯一道路

在书中，柯文分析了与“冲击—回应”模式相近的“传统—近代”模式。他认为，这种模式“适应了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社会科学家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被用以对付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落后’和‘未发达’现象的解释。同时它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说法来解释‘传统’社会如何演变为‘近代’社会”。“冲击—回应”模式将中国历史简化为所谓“传统停滞”的落后状态到“西方化近代”先进社会的线性演进过程，认为只有在西方冲击下才能实现近代化。柯文认为看待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不能只从西方人自己的角度出发，因为西方近代化本身也

是“正在研究的问题的一部分”，西方人“对近代世界的理解与感受是具有很大独特性的”，如果“自然倾向是把自己的经验普遍化”，就是美国汉学家石约翰把西方称为的“当代伟大文明中目光最为狭隘的文明”。他反驳指出，中国的江南市镇其实在1840年前就已出现契约劳工、股份制商业等“现代性元素”。

柯文明确反对“传统”与“近代”的二分法，因为“这种两分法迫使我们面对现实只能严格地按两极来划分，排除任何中间的可能”。这种两极对立做法忽略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他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孕育了近代化因素，“中国传统社会似乎在内部哺育着某种和近代经济发展比较相符的价值观念和特点”。实际上，“近代化理论中根本的种族中心主义”有一个明显的前提假定，即只有西方的近代化才是正确之路，而这是柯文极力反对的。他批评说，由于西方人认为自己最早完成了近代化，因而习惯将自身的近代化经验普遍化，并把它视作衡量其他民族和国家近代化的尺度，没有考虑到其自身的近代化其

实也有很大的特殊性。他指出，这种错误观念是因禁自己的“狭隘牢笼”，不能解释非西方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因此，他提出要“超越‘传统与近代’”，从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

“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

柯文在为2010年版《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所写的序言中谈道，“持续不变的关怀是我决心进入中国内部，从中国人自己的经验重建其历史，而不是根据西方人觉得重要、自然或正常的角度”。柯文认为，“必须从中国自身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寻找历史变革的逻辑”。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演变，柯文认为中国社会内部本身就存在着变革的动力，“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他指出，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18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若干

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如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的增长与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化、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

柯文提出，“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从置于中国历史环境中的中国问题着手研究”，毕竟“这些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衡量这些问题之历史重要性的准绳也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他认为，“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第二，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第三，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第四，要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可以说，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在否定西方中心观的同时，也在迎接世界视野下的中国观，为推动中国学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学问做了一些重要的学术准备。

从外国人著作
看中国